



2016年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新时期治国理政理论研究

2016

XIN LI NIAN
XIN SI XIANG
XIN ZHAN LUE

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我们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新时期治国理政理论研究

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时期治国理政理论研究 / 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编.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7
ISBN 978-7-219-10338-8

I. ①新… II. ①广… ②广…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②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①D616 ②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184824 号

责任编辑 严颖 罗雯
责任校对 尹诗好
装帧设计 子浩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 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10338-8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委员会

主 编：梁培林

副 主 编：靳晓斌

成 员：钟 洁 黎伟盛 邓双霜

吴晓霞 周 宇

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实现“全面治理”的目标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努力。深入研究国家全面治理并推动其实现，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出版这本文集的初衷。同时，我们还希望借此文集的出版，一是进一步助推学界关于治国理政的研究热潮。治国理政不仅是为解决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一些新问题，而且是我们党今后长期的执政理念，其内容会随着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更新，可以说是常提常新、不断发展着的。二是尽可能使人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治国理政这一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此，本文集尽可能多维度多方面地阐释治国理政，内容包括反腐与廉政、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治理等。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三是为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培养一批政治坚定、功底深厚、勇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我们不仅要为已能够独当一面的中青年学者提供发声平台，也要为拥有学术热情和潜力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提供同学界专家交流学习的平台。

本文集是从“新时期治国理政学术研讨会”（2016年5月28日召开）的入选论文中精选而成。文中一些话语如“三个自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等，在本次学术会议召开数月后转换为“四个自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等，但是本文集仍基于当时政治语境沿用“旧话”，以为读者能够追踪到现代话语的发展轨迹。当然，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有限，并受到学术眼光的局限，难免会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以待在后续的文集中完善。

目 录

- 001 认真总结系统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新的理论成果 / 杨金海
- 020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 周利生，王耀鸿
- 029 论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思想 / 黄高晓
- 040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 王钰鑫
- 052 论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 / 岳鹏
- 060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初探 / 付文科
- 072 把握基本主题，深刻领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 许进品
- 082 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育人思想
——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圆梦人”的目标、内容、路径 / 赵浚
- 092 习近平脱贫基本方略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 李伟
- 102 纠纷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式解纷理念与路径 / 李立景，黄龙
- 111 财富分配、风险分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冯志宏
- 118 论分配正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 / 张学博
- 136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 常朝阳
- 151 国家治理视阈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 梁培林，靳晓斌
- 160 中国共产党网络新闻舆论引导力提升研究 / 黎伟盛，吴晓霞，邓双霜

- 169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价值考量的价值考量 / 刘先春, 葛英儒
- 180 政治生态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党内民主的视角 / 孙秦敏, 朱映雪
- 189 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主题 / 雷蕾
- 203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 / 张艳娥
- 215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赵绍成
- 222 “共同富裕”到“共享”的与时俱进与一脉相承 / 曾斌
- 231 在落实治国理政总方略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 孟财
- 240 价值、制度与绩效：转型期政府信任提升的对策思考 / 王莹
- 248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 杨天保
- 256 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构路径研究 / 张元
- 278 当代社会治理的三个伦理向度
——再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 李玉雄
- 285 民主与秩序：治理民主视阈下的公民参与 / 蔡文成, 黄娇
- 297 反腐倡廉建设与增进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感 / 肖云忠, 李师
- 310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经济转型动力转化及路径 / 王政武
- 323 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 / 耿超

认真总结系统把握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新的理论成果

杨金海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共中央编译局, 北京 100032)

摘要: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核心是以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宗旨的“全面治理”思想, 围绕这个核心, 习近平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改革治理、促进全面发展的根本方向、战略目标、主要任务、根本途径、重要方法等,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键词: 治国理政思想; 全面治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治国理政思想。这些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是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在对我国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的。这些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新的历史阶段, 应该如何治国理政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把我们 30 多年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认真总结梳理这些新成果, 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地学习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与前人理论的关系, 有助于构建 21 世纪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助于深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新的实践基础和时代特点

习近平指出：“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1]那么，我国现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是什么？应当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2]这表明，尽管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世界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这一基本国情的内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对此，习近平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即“当前，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3]。

的确，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不容回避的是，这些年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从经济上看，我国发展差距较大，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收入差距等参差不齐，而且发展方式比较落后，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反应比较强烈，意见比较大，也比较集中。从政治上看，干部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从社会发展上看，这些年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五大问题，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环境等。从思想文化上看，这些年人们思想很活跃，这有利于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但是思想太活跃、太自由了，就容易产生负面现象，即思想混乱。一些人公开挑战我们的意识形态底线，即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挑战社会主义制度，挑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换挡期。众所周知，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虽然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国家，但是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势头仍然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时

期，或曰过渡时期。这可能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这个换挡期与此前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期相比有很多新特点，但总特征就是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正在并将需要继续实现转型升级。具体来说，这个换挡期至少有以下七个特点：

（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由“进行时”向“完成时”转变

欧美主要大国之所以叫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主要就是因为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已经进到了“完成时”阶段。而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还处在“进行时”阶段，这是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最典型的特征。但是，我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即将结束。一些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等大规模的建设基本完成，大中型城市如各个省会城市等也即将完成，只有三线城市以及西部地区仍然处于“进行时”状态。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与这个特点相联系。

（二）我国正在从经济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转变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正如有机体的增长一样，任何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在初期增长都比较快，但当它发展到一定体量时，增长就会减慢，直至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我国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体量已经较大，因此它的增速变慢，即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是正常的。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随着体量的进一步增大，它还会进一步减速，进入到中速的平稳发展阶段。当然，这种转变会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也使人们心理上感到不大适应。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主动自觉地调整。

（三）我国正在从粗放型经济发展向精细化经济发展转变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的大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大模样已经有了，但还很粗糙，需要进一步升级改造，使之更加精致。比如，经济结构要调整，使得以往依靠廉价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低端经济向更多地依靠高科技的高端经济转变；即使是传统工业、农业，也要升级改造，与信息化、城市化结合起来，提升产品的质量；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与整体的生产结构升级改造相适应，我国的交换体系、分配体系以及消费结构都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果能够顺利完成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我国经济就将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否则，将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我国正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过去几十年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那么现在要靠消费来拉动。中国的消费结构目前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性的消费结构变化，如钢筋、水泥等基础设施建设材料的需求大大减少；二是生活性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原来人们的生活消费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消费，而现在大部分人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将来的消费主要是高层次的以精神文化生活为主的消费，如文艺、体育、保健、旅游、休闲，以及与此相关的电子通信、交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消费。一个更具时代特点的消费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

（五）我国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

目前，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超出了原来设想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800 美元的小康水平，人均 GDP 将近 8000 美元。相应地，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已经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水平。但由于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差距较大，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还很低。我们要在几年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扶贫攻坚、福利体系建设等方面付出极大努力。同时，还要照顾到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不能影响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果分配不公问题长期存在，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但如果过分搞福利体系，又会落入“社会福利陷阱”，造成“福利病”，使平均主义重新作怪，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六）我国的国家治理正在从以往的国家管理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完善，人们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等也越来越强。但我们的治理体系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比如，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执行力不够，人民群众意见较大。又如，我们习惯于靠政府部门去管理，而随着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化，只靠政府管理已经不够，还得依靠社会组织等来全方位治理。比如行业协会，它虽然没有政府的管理职能，但可以发挥其在行业中的权威作用，通过制定行业规范等，帮助政府治理所在的行业。但这方面工作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再者，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越来越强，尤其是涉及切身利益问题，人们都知道要用法律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现代

化，政府要逐步地从过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七）我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正在发生新的跃升。以往主要是学习、引进外国的文明成果，包括吸引外资，引进项目、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今后我们在继续学习引进国外成果的同时，对世界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包括对外投资，输出技术、劳务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新的对外开放模式的典范。今天，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致达到 30%，将来还会更高。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作用的壮大，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将日益凸显。在 2016 年 9 月 3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得到广泛认同。这昭示着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乃至引领作用。与此相应，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中国精神、中国在诸多领域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也会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关注乃至认同。但是，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我国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还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不愿看到中国和平发展，千方百计要给我们的发展制造麻烦，设置障碍。处理得好，我们会冲破重围，否则，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前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国内外一系列问题，都跟我国发展换档期的特征联系在一起。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邓小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预见到的问题，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当时，邓小平所预见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主要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问题，包括上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福利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国以往改革发展中所没有遇到甚至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是关乎全局的大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满盘皆输”的局面。所有这些实践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反映到人们的精神上来，就会出现各种思想矛盾。

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答案就是要加强治理。因此，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入分析研究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提出了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拓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全面治理的新境界。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思想的崭新特征及其深远意义

应当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就是“全面治理”思想，集中体现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打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一核心思想的总体特征是抓“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通过治理整顿，促进全面发展。

所谓“全面治理”就是要用全面的、系统的、辩证的观点协调解决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就集中体现了“全面治理”这一核心思想以及总体特征。就具体一些的问题来讲，也是如此。比如，在经济社会领域，要解决好人们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今后若干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经济建设来讲，要全面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等；就社会总体发展而言，要全面协调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习近平的“全面治理”思想与先前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全面治理”当然不是为治理而治理，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但其内涵却大大向前发展了。“全面治理”的重点在制定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长远管用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机制，并形成一套可以操作的方案。其中包括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目标任务、战略方针、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而且，所针对的上述问题很多是全新的。因此“全面治理”思想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和丰富的实践内涵。

“全面治理”思想的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第一次，使我们对“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我国未来发展大趋势的把握更加准确。

“治理”和“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发展”重在促进经济增长，“治理”重在平衡各方关系。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形成之后，发展是首要任务。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不平衡。这时，就需要

治理整顿，协调各方面关系，实现新的平衡。这应当说是任何社会治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执政者不能主动治理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这些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全面爆发，这时社会危机就到来了。通过危机或社会革命，社会有机体在付出沉痛代价后会回到平衡状态，这是社会系统通过自我调节实现的“自发治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就是如此。资本主义在其经济发展中，由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始终自发起着主要作用，所以其经济总是在“繁荣—危机—繁荣”中循环发展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在自发地完成“治理”的功能。尽管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单纯靠市场调节，政府也需要适当干预经济，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始终存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则在于能够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并能够通过自己的制度体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自觉治理”。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国家的自觉治理，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进行了探索，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治理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很短时间内领导人民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根治了内外反动势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大乱。有了这些基本制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有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尽管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那是在个别体制机制层面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基本制度产生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当时出现的所谓“大民主”思潮，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几条都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规定的内容，绝对不能丢，丢了我国的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又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战略措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加进来，于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样，“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等内容，就成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

这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动，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具体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推进我们的治理体系。在具体的治理方面，毛泽东、邓小平也有很多的创造。比如，毛泽东时期有过一次大的

治理整顿，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左”的情况，即出现了“大跃进”“共产风”等，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困难。因此，从1961年开始，党中央决定进行大的经济调整。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进步。主要做法就是扩大了私营经济和市场的的作用，即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遗憾的是，这项成果不仅没有巩固下来，而且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否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被打乱。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对“文革”造成的乱象进行大刀阔斧的治理。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纠正“文革”时期“左”的做法，使得经济建设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即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允许私营经济在一定范围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最后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有优越性，可以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治理，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业，需要在探索中前进。新中国这60多年的发展和治理实践就是在探索中不断进行的。

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尽管起初很好，但时间长了都会出现不平衡、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就是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的不平衡问题。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积极作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若治理不得力，其消极作用也会很大，如出现贫富差距、唯利是图、假冒伪劣、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理整顿。由于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涉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改革治理的难度会很大。其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同时，还出现了发展中的新矛盾，如经济结构落后、生态环境破坏、国际环境复杂化等。这些长期积累的历史问题与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相互交织和叠加，会使得治理改革的难度加倍。

由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看出，“治理”与“管理”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差别。“治理”强调的是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目的是要从全局的高度平衡各方关系；“管理”则主要是维持一定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的秩序。我们今天所讲的“全面治理”，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全民共建共享且符合经济社会升级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大格局。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具有深远的